

中国近代

军阀人物志

主编 蒋立文 姜成文
高乐才 陈 祺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近代军阀人物志

主 编

蒋立文 姜成文

高乐才 陈 祺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近代军阀四题

(代序言)

胡维革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的国情和掌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有重大的教益和启迪。因此，几十年来，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们都在这块田地上进行了孜孜矻矻的耕耘，并撰写和出版了一大批拓荒性的、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例如：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李剑农先生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来新夏先生的《北洋军阀史略》等。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北洋军阀史的丰硕成果，而且是后学们学习入门的参考书。但是，时至今日，对近代军阀人物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还一部也未问世，这又不能不说是近代军阀史研究的一大缺憾。最近，蒋立文同志组织同仁，不畏艰难，探隐发微，撰写出了《中国近代军阀人物志》一书，堪称为近代军阀史研究填补了某些空缺。在该书付梓之际，作者嘱我作序，鄙人力实不逮，但愿借此机会就中国近代军阀谈几个问题，以作为阅读该书的入门材料。

—

无论古今中外，哪个国家都有军队，这是世人皆知的常识。不过，必须指出，在一般国家和一般情况下，军队都是军事武装集团，而很难成为军事政治集团。但在近代史上，中国却出现了世界罕见的现象：军队不仅成了地地道道的军事政治集团，而且割据地方，操纵政局，统治中国长达15年之久。中国近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固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归根结底，它正象毛泽东同志早在1928年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9页）。这一经典论述明确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军阀割据局势和军阀操政形势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外国帝国主义从19世纪末，曾相继在中国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的政策。当中国有一个他们认为是顶“强人”时，他们就共同加以支持，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就是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时的所谓“统一”的原因；但中国还没有一个他们认为是最“强人”继起时，他们就十分需要分别培植一些走狗，加以支持，使其成为自己势力范围的看管人。他们物色好对象以后，就不惜从财政上、武器上以及其他方面进行帮助。而武器对于“有枪就有势”的军阀来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地方军阀就是靠着它进行割据和混战，以造成自己的军阀势力。其次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当时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尚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主阶级在广大地

区进行着封建剥削。军阀不仅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而成为它的政治代表，而且本身也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因之，军阀势力很自然地获得地主阶级多方面的支持，而地主阶级的剥削也依靠军阀的统治而存在。同时，更因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社会经济的衰落，大量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游民，这又为军阀提供了兵源。即使当时没有游离出来的游民，还可以通过地主阶级在农村中“派差”、“抓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样，军阀从帝国主义手中得到金钱和枪械，从地主阶级手中得到金钱和兵源，便可以毫不费力地组建军队。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便出现了军阀势力，出现了军阀割据，出现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局面。

二

中国近代军阀从何时产生，其沿革情况怎样，这是研究近代军阀和近代军阀人物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概括说来曾国藩团练湘军是近代军阀的产生，但直到辛亥革命前，这些近代军阀尚没能掌握中国的最高统治权，仍然依附于满清封建王朝；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才是近代军阀统治中国的开始；袁世凯死后，中国大地上军阀林立；1928年，旧军阀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所代替。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为建新式陆军，派原长芦运司胡燏棻到离天津70里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训练“定武军”。1895年，温处道袁世凯招致幕友，译撰兵书12卷，并拟订训练新军计划，最后通过攀缘荣禄等要人，于同年12月到小站接替胡燏棻训练新军。袁世凯到任后，一方面继续加聘德国洋员至10余人，由巴森斯参赞营务兼管教练，伯罗恩担任德操教习，祁开芬担任炮队教习，曼德担任马队教习等；另一方面延用宿将和

从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如姜桂题、杨荣泰、吴长纯、徐邦杰诸人，皆隶麾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段芝贵、曹錕等，皆属偏裨其中，徐世昌担任参谋，冯国璋担任步兵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担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担任工程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不久，将定武军10营4750人扩充至7300人，称新建陆军。近代军阀由是发轫。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出现了地主阶级的清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南京临时政府对峙的局面。袁世凯凭藉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陈兵长江，一方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方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从此，北洋军阀开始统治中国。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不仅北洋军阀内部分崩离析，而且全国各地军阀四起，从此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在这期间，全国各地主要有以下七大军阀势力：

皖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为首领，主要头目还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等。其以日本为靠山，权势最大，长期把握着北京中央政权，势力在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甘肃、福建等省。

直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河北河间人冯国璋为首领，主要头目是当时的“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錕、吴佩孚继起为首领，还有齐燮元、孙传芳等。其以英、美为靠山，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

奉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奉天海城人张作霖为首领，还有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王永江、张宗昌等头目。其依靠日本，控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

晋系军阀：以山西五台人阎锡山为首领。他坐守山西，窥测风云，回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滇系军阀：以云南会泽人唐继尧为首领，主要占据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

桂系军阀：以广西武鸣人陆荣廷为首领，主要占据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

辫子军：以江西奉新人张勋为首领，以清末“定武军”为主力，盘踞徐州，独树一帜。他与德国和日本相勾结，留恋清室，敌视民国，手下官兵都留着辫子，以示愚忠。

此外，还有许多小军阀，如湖南的谭延闿，广东的龙济光，四川的刘存厚，贵州的刘显世等，他们或割据一省（称为督军），或割据某一地区（称为镇守使），拥兵自重，各霸一方。

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直到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才告结束。

三

在1916至1928年的整整12年时间里，这些大小军阀无恶不作，给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板又涂抹上了更黑暗的一笔。其祸国殃民的勾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战乱频仍。盘踞在各地的大小军阀，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或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地盘，互相间不停顿地明争暗斗，火拼厮杀，使整个中国兵燹遍地，战乱不已。其中，大规模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直奉国战争等，小规模斗争如齐卢斗争、胡憨斗争、东南奉浙斗争、东北奉国斗争等。据1923年8月孤军杂志统计，仅在1912至

1922年10年间就有大小内战179次。如此频繁的战争，每一次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例如，吴佩孚兵入河南，铁路工会及其他工会一概受到摧残，其余民众团体领袖不是残遭杀害，就是被捕入狱。杞县的红枪会和农民反对苛敛税捐和预征钱粮，吴佩孚和寇英杰便派大兵征剿，杀戮4、5千人，轰毁10余座村庄，奸掠酷刑无所不至。战乱频仍，人民在无边无涯的战火中苦苦挣扎。

2. 政潮迭起。各派军阀势力不仅割据地方，而且竞相控制中央政权，使中国政潮迭起，总统更换频繁。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代行大总统职权。后因“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1917年7月2日，黎元洪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务，6日，冯国璋通电代理大总统，8天后黎元洪通电去职。1918年10月，段祺瑞赶走冯国璋，请出徐世昌，于10月10日正式担任大总统。1922年6月11日，直系军阀又驱逐徐世昌，请出黎元洪任大总统。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又被直系军阀赶走，北京政府由国务总理高凌霨摄政务。10月2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1924年11月2日，冯玉祥部幽禁曹锟，代国务总理黄郛代摄总统职权。11月2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冯玉祥会议拥护段祺瑞，段祺瑞随即担任临时执政。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在直、奉军阀和国民军的反对下，被迫下野，由京去津。自此以后，北京政府即由代总理胡惟德、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等相继代行政务，并没有“大总统”、“执政”之类的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自封为海陆军大元帅，才宣称“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总统治权”。1928年6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阀建立统治，北洋军阀操纵中央政权的局势方告结束。在1913至1928年的短短15年时间里，大总统更换8次，还有三段时间没有

总统，“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政局一片混乱。

3. 卖国投敌。各地大小军阀为了从帝国主义手中得到金钱和武器，无不卖国投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世人皆知，自不必说。段祺瑞也是一个卖国的能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竭力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在1916至1918年的两年内，段向日本借款总数达38645万日元。其中，多由他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因此这一时期的借款统称为“西原借款”。日本政府通过借款，攫取了中国大批政治和经济特权。日本的顾问、军官布满了段祺瑞政府和军队。中国的盐余、库券、铁路财产、资源财富、新税收入、地方企业红利等等都成了借款的担保品。日本取得了东北、蒙古铁路修筑管理权，无线电台和有线电台的设立权，吉、黑二省的森林金矿采伐权，技术人员的任用和材料的优先购买权，以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18年5月段祺瑞与日本签订所谓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中国海陆军指挥权，日本军队还可以开进中国的东北全境。这样，各地大小军阀竞相卖国，中国的主权和利权几乎被出卖殆尽。

4. 搜刮民财。一方面，各地大小军阀豢养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因而他们采取举借内债、苛捐杂税、滥发纸币、栽卖鸦片、摊派兵差等方式，大肆搜刮民财。另一方面，各地的军阀还通过搜刮民财来扩大自己的私产。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霸占了大量的土地。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占有全县1/3的土地。奉系军阀吴俊升任黑龙江省长时，在1924至1925年一年间，攫取的土地不仅几遍于黑龙江省，而且还在吉林省的洮南有2万多亩。他们还在各种企业中投资，并利用政治势力，排斥正当的经营者。如皖系军阀倪嗣冲在安徽包办煤矿铁路，不许别人插手；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奉天扩大自己的银号，将其它银号排挤得纷纷倒闭。他们

又有大量的现金动产，如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去任时有6000万元，河南督军赵倜卸任时有3000万元，直隶省长曹锐在任6年，敛财4000多万元，张作霖在郭松龄倒戈前，在日本银行存款有2000万日元，张宗昌有400万日元，孙传芳有1300余万日元。其它有数百数十万元者，几不可胜数。由于各地军阀的尽性搜刮，广大人民深深地陷入了“债务丛集”、“叫苦不迭”的绝境。

四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随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8个军共10余万人，从广东出师开始北伐，近代军阀（即北洋军阀统治）的末日到来了。

在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前，北方各军阀的形势大略如下：

1. 直系嫡派的吴佩孚，失败再起后与奉系联合打败国民军，据有湖北、河南两省及直隶之保定、大名一带，京汉线的全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2. 直系后起的巨头孙传芳，以南京为根据，宰制苏、浙、闽、皖、赣五省，对吴佩孚虽表尊崇，但已不欲居其下风，其实力亦在吴佩孚之上，自取得五省地盘后颇想作三国时代的孙吴。

3. 奉系军阀，自将国民军赶出北京后，在关内据有京奉线及津浦线的北段，李景林为张作霖所恶，被迫失势，直督的位置由张作霖授给张宗昌的部下褚玉璞，山东仍属张宗昌。孙传芳表示不北犯，张作霖和张宗昌亦表示不南下，颇有放弃旧怨言归于好之势。

4. 冯玉祥的国民军，困守西北。冯玉祥已赴苏联，其军队由部下张元江等主持，东面扼守南口与奉、直相持，南面死争西

安与刘镇华为敌。在广东出师北伐以前，冯玉祥已感独立难存。

5. 还有一个据守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他既不为国民军之友，也不为直、奉之敌，而是采取一种随风转舵的政策，力保自己的势力永不动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进军，其中湖南、湖北是主要战场。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叶挺独立团和其他革命军一起攻克武汉，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其他两路分别向江西、福建进军，先后攻克南昌、九江等地，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北洋军阀嫡系的两大势力完全被消灭。1926年8月，国民军将领李鸣钟抵广州，向广东政府报告冯玉祥率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4月，阎锡山宣称所属部队服从三民主义。1928年12月，奉系军阀的继承者张学良，宣言改旗易帜，归化国民革命军。至此，近代军阀覆灭。

但是，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因此，北洋军阀虽然覆灭，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代之而起，中国人民仍然没有解除军阀之苦。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阀才在中国大地上彻底绝种。

目 录

中国近代军阀四题(代序言).....胡维革

曾国藩.....(1)

左宗棠.....(18)

罗泽南.....(39)

曾国荃.....(44)

刘坤一.....(49)

李鸿章.....(57)

刘铭传.....(66)

张树声.....(79)

吴长庆.....(87)

袁世凯.....(96)

徐世昌.....(110)

王士珍.....(121)

张 勋.....(130)

段祺瑞.....(141)

徐树铮.....	(153)
倪嗣冲.....	(162)
冯国璋.....	(170)
曹 锜.....	(178)
吴佩孚.....	(187)
孙传芳.....	(198)
张作霖.....	(206)
吴俊升.....	(226)
张作相.....	(235)
杨宇霆.....	(244)
王永江.....	(254)
张宗昌.....	(264)
唐继尧.....	(273)
陆荣廷.....	(287)
陈炯明.....	(299)
阎锡山.....	(313)
后 记.....	(322)

曾国藩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生于1811年，死于1872年。先世原为湖南衡阳籍贯，清初迁至湘乡。“科举正途”出身，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历任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擢礼部侍郎，历简兵、刑、工、吏等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兵过湖南，时值曾国藩丁忧在籍，奉诏协助地方官办理团练。他手创湘军，与太平军周旋作战十余年，终于扑灭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农民起义之火，为没落的清朝统治阶级赢得了一段回光返照的统治时期。曾国藩，做为虔诚的封建主义卫道士，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洋务运动的肇始人和传统文化修养的集大成者，堪称为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近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生活于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化时期。他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成为封建末世的所谓“中兴之臣”并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家道上升中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祖、父两代封建忠孝思想和艰苦创业精神的熏陶。祖父曾玉屏，号星冈，生有两子。长子曾竹亭，即曾国藩的父亲。星冈少时曾与乡里阔少往来游乐，酗酒不羁；而后一改前衍，刻苦耐劳，每日未明即起，终生不曾倦怠。星冈对国藩管教尤严，后曾国藩所谈治家教子乃至修己治人之方，大多发源于此。父竹亭以教书为业，久试不第，年43始中秀才。竹亭督子最严，“往往在稠人广众

之前，壮声呵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之处，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曾国藩5岁开始在家塾读书，6岁时，竹亭亲授学业。自道光四年（1824年）先后七次小考，十三年考取秀才。次年乡试中举。十五年会试落榜。归乡途中，“贷百金于金陵购书，诵习日勤，”十八年，终以第38名考取进士。

曾国藩京宦十年，轻车快马，岁有升迁，由一介寒士跃为二品大员，深得上层统治者赏识，如此升迁如意，在当时是甚不多见的。这一重要经历决定了他与整个统治阶级心心相印的基本立场。

曾国藩在中进士前，主要是为博取功名而沉醉于科举词章，入仕后则开始在学术思想上进行深入探索。他充分利用京师做为封建学术中心和自己早年多任要职的有利条件，在儒学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自我训练，由一位仅通八股试帖的普通学子，成长为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学术修养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首先，他承袭了宋明理学注意内省的传统，从“静”、“敬”、“慎独”方面下手，做一番修己治人的功夫。京宦期间，太常寺卿唐鉴与大学士倭仁以理学相号召，给曾国藩很大影响。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最是“静”字功夫要紧，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倭仁用功笃实，每天言动皆有劄记，见过自讼。在其影响下，曾国藩以朱子为日课，而致力于宋学。道光二十四年，他为自己制订《五箴》，规定了立志、居静、主敬、谨言、守恒为努力的准则。这一时期，他的日记中多有痛自劄责的记述，如“陈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我处世不患精明，患在刻薄”

“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詖，其我之谓乎？”；“清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①这些文字不仅刻画出曾国藩刻薄、傲慢、巧言令色、语不由衷、为人两面的本质，也可以

看出他在理学自我修养中所下的功夫。他还按照理学的规范给自己规定了课程，内容包括学习的指导思想、必修内容、学习方法、道德修养等。随着对封建文化的深入理解，曾国藩在修己治人方面特别强调“敬”、“恕”二字。他说：“‘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生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理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②。曾国藩认为贤臣的第一要义忠君，与诸兄弟常以“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相勉。通过这番修炼，曾国藩把自己规范成一位虔诚的封建主义信徒。

其次，在学术上他反对门户之见，力图从根本上弘扬封建主义文化。他尊崇理学，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理学只是他学问的一个方面而已。他对儒学各派、诸子百家乃至游侠刺客都采取兼收并蓄，择长而用的方针，对汉学、宋学、帖括、考据之学都曾下过苦功并有较深造诣。但是这些学问都没有束缚他的眼界，对于封建文化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所理想的大儒是明道救世，而且是具有“圣王”双层资格的人。他站在拯救封建颓势的立场，特别欣赏孔孟所提倡的做为经世大法的“礼”，认为只有礼学体大精深，可通汉宋两家之结。在政治上他主张实行“礼治”，提出“以礼自治，以礼治人”^③。希望通过自治，教育统治阶级加强自我修养，认清“四方多难，纲纪斋乱”的形势，要“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以加强内部团结，必要时要有自我牺牲精神，通过治人使被统治者做到“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把人们的思想重新规范到礼治，也就是封建纲常等级名分的轨道。曾国藩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阐发具有指导统治阶级应付危机局面的现实意义。

再次，曾国藩在治学思想上主张合学术事功为一，学以致用。在一般学者看来，传统的学问不外三门，即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

曾国藩却把经世之学做为是一门学问明确地標示出来。同时认为可以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学经纬万汇，是以上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曾国藩在京都供职，正是清政府内扰外患交迫之时。在他的家书中常有他关心时务的记述。对于当时“英夷”、“粤匪”、“河患”等问题均有缜密的研究和具体的计划。他劝戒诸弟，应留心实学，不可专注于功名得失，若一味为求取功名读书，则“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他认为天下事无一件不是学问，而为学之道在于到处留心，摘由备查，博览书籍。他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等学问都悉心研究。在工部任职时，“尤究心方輿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④在清。代考据学风充斥社会的风气下，曾国藩如此重视将封建理论用于“经世致用”，是继龚自珍、魏源之后又一代表人物。

长期的京官经历和儒学濡染使曾国藩成为一名封建制度的自觉维护者。他以诚字自诩，以卫道者自居。在近代，对于封建传统文化有那样精深的造诣并将之坚定地用于保卫封建制度的政治实践中的封建大家，当首推曾国藩其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曾国藩是中世纪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者。

二

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事业，无疑是历经十余年的惨淡经营，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他以书生操杀生之业，除了立场使然外，其更深刻的原因是由于虔诚坚定的封建主义信仰导